

# 和珅到底贪了多少？ 所谓八亿两 实为后人杜撰

和珅跌倒，并没有让嘉庆吃饱，八亿两白银只是以讹传讹。对于这个刚刚经历了盛世的帝国而言，一场被世界拖累的金融危机正在到来，是为“嘉道中衰”。

和珅死在狱中，貌似案子已经结束了，但真正让人好奇的事情才刚刚开始，和大人到底贪污了多少钱？



和珅像

## 和珅跌倒 嘉庆有没有吃饱？

1799年2月26日，就在皇帝宣布和珅一案结案的三天后，直隶布政使吴熊光的一份奏折被呈递到皇帝手中。奏折中，吴熊光对皇帝的“仁至义尽、折衷至当”表示深深的钦佩。

皇帝表示对和珅及其家人隐匿寄顿在民间的财产放过一马，因为这些财产不会产生任何危害，但“若稍滋事，所损大矣”，要吴熊光“慎之”。

皇帝的大度只是表面上的，实际上嘉庆皇帝一分钟也没放松对和珅财产的觊觎。在另一份来自内务府的密奏里，三位皇室宗亲——肃亲王永锡、贝勒绵懿和新任总管内务府大臣永来，将在海甸查抄和珅及其同党福长安的花园财产情况，缮写清单供呈御览。

皇帝在这份奏折上没任何批复，但显然，他对这一切的处理表示很满意。因为在同一日的谕旨中，皇帝

下令将“和珅、福长安的花园内金银器皿、银钱、房间并内监交内务府入官办理”，而玉器、衣服、什物则“照例交崇文门分别拣选进呈”。

皇帝从来没像吴熊光奏折御批上的那样宽容大度，他的眼睛始终盯在和珅的家产上，那么皇帝为何对查抄和珅的家产如此挂心？难道真的是因为像后世笔记中所说的“和珅跌倒、嘉庆吃饱”？

从史梦兰的《止园笔谈》到薛福成的《庸坤笔记》，再到徐珂的《清稗类钞》、天台野叟的《大清见闻录》，一份“和珅家产清单”通过这些好事文士的稗史笔记在民间流行。

在这份清单中，和珅没有悬念地成为贪污之王。清单记载，和珅被抄家产共计109号，内有83号尚未估价，已估者26号，合计银22389万5160两。按照另一本《坤机近志》中的统计，

“其家财先后抄出凡百有九号，就中估价者二十六号，已值二百二十三兆两有奇。未估者尚八十三号，论者谓以此比例算之，又当八百兆两有奇”，这也正是时下流传的和珅家产达到8亿两，相当于大清国十余年财政收入总和的来源。

但经常被后人忽略的一点是，《坤机近志》这本书初版于1910年，并且被收入革命党人胡朴安的《满清野史》当中，而胡本人很可能正是这份清单真正的作者。而和珅贪污8亿两的传说，也由此扩散开来，成为今天中国历史教科书上的不易之论。

那么，和珅的家产究竟有多少？考虑到档案缺

失的缘故，这个数字至今尚难计算。一份保存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名为《和珅犯罪全案》的档案中包含一份详尽的《预览抄产单》，看似可以解答这个问题，但其真实性，经过冯作哲的严密考证，已经被证明是道光时代的产物，错漏百出。

这份所谓的“全案”，恰恰是后世那些以讹传讹的稗史笔记的源头。所以，唯一可信的史料，就只有上谕、参与查抄官僚的奏折和内务府的折片，而这里面的数字加在一起，总数甚至不会超过4000万两白银，更保守的估计，则指出这个数字也许仅在1000万两上下——这恐怕是这位贪污之王真正的极限了。

## 银子都去哪儿了？ 进了皇帝的腰包

真相诚然令人失望，但在嘉庆看来，也已是一个令人心悸的数字了，清中叶户部最丰裕的时候，也只有800万两白银左右。

很少有人追问，这笔钱款的去向，很少有人注意到查抄家产的奏折中频繁出现的“内务府”及其下属的“广储司”，而这个部门恰恰是和珅查抄家产的真正去向——它们既没有被存入国库之中以备不时之需，也没有成为军费支援前线官兵，而是分类按批进入内务府的不同部门之中。

内务府可能是有清代最神秘的有关部门之一，其神秘性不在于其组织结构和官职设置，这些都很容易在公开编纂发行的《大清会典》中查到。它的神秘之处在于，这是一个由政治背景可靠的满人执掌的皇帝“私人钱箱”。从乾隆朝以来，每年国库都会固定向内务府划拨60万两白银用于皇室支出，但可以肯定，内务府的收入绝不止于此数。

被嘉庆赐死的和珅就曾经主管内务府，深知个中玄机。这位善于敛财之道的臣僚在内务府总管任上颇得乾隆圣心嘉悦。

和珅最匪夷所思的发明是议罪银制度，这玩意近乎钓鱼执法，皇帝在得知官员过失后，会寄一道密谕给该官员，当官员战战兢兢地读完皇帝的严厉申斥后，看到御批最末的“自行议罪”和“自问该当何罪”时，就明白到了该掏钱的时候了。如果皇帝对官员所交的罚款满意，就会在奏折的后面批上一个“览”字，待官员将罚金如数上交后，这笔

君臣间的交易就算圆满完成了。这当然是一笔秘密的一锤子买卖。

大部分交易都会被详细地记录在一份名为《密记档》的档案中。有学者统计过从1749年初具雏形到1805年嘉庆皇帝废除该制度之间的110宗罚议罪银案例，发现最盛时恰恰是和珅当政的1778年至1795年，共计101件，其中共罚银两合计499.55两，流入国家公共财政体系的，仅占其中的29%，用于海塘河工和军费的部分分别只占16.2%和10.6%，而其中高达285.05万两，占总数大部分的，则全部作为皇室经费流入内务府和乾隆皇帝最喜好的南巡盛典之中。

当然，来钱最快的是抄家，每一次抄家少则数十万两，多则上千万两的收入，皇帝在对贪腐行为痛心震怒之余，抄家的巨额进项自然就是对他的心理安慰。

因此，当和珅倒台后，他庞大的财产，无论是4000万还是1000万，都顺理成章地落入皇帝的腰包。

皇帝为了表示自己不是好货之主，尽力做出慷慨大方的姿态将这些昔日的赃款进行公平分配。珠宝玉器、首饰、字画、绸缎等都先行归入内务府库中。再拿出一小部分让近支王公利益均沾，数目不会多，以免开启奴才们的贪鄙之心。

至于房产，除了一部分（不到总数四分之一）给和珅之子丰绅德德和他的妻子（皇帝的姐姐），还有被皇亲国戚瓜分，其余也都收归内务府进行继续经营。（新周刊）

## 李时珍原是 弃文从医

许多人都知道大作家鲁迅弃医从文的故事，然而大家却未必知道李时珍在从医之前也经过了一番艰苦的思想斗争。只不过他不是弃医从文，恰恰相反，他是弃文从医。

李时珍之所以在中国的历史上，尤其是医学史上具有极其崇高的地位，最主要的还是因为他写出了一本著名的医书——《本草纲目》，这本书被外国人称为是“东方药学巨典”“中国的百科全书”。

其实李时珍一开始并没把从医当成自己的理想。李时珍的父亲与爷爷都是相当不错的医生，他们都希望自己家里出一个读书人，希望有个人能够通过科举考试走上仕途，不再行医。可这个希望一再落空，最后他们都把愿望寄托在李时珍身上。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李时珍只考中秀才，之后每次都落榜告终。

据记载，李时珍考中秀才后还参加过三次乡试。第一次参加乡试是在他17岁那年，地点在武昌。因患有眼病，加之紧张，可能复习也不到位，三场考试过后，他名落孙山。

落榜后的李时珍读书更加刻苦，不久他娶了一个大户人家的小姐吴氏为妻，妻子并未反对他考取功名，还经常鼓励他。公元1537年李时珍第二次参加了在武昌举行的乡试，这一次，他再次榜上无名。

这时的李时珍有些犹豫，要不要再考。然而父亲李言闻却极力主张并支持儿子继续考下去。为了不辜负父母的希望，李时珍决定再考一次。这时的李时珍不但体弱多病，而且有很大的心理压力，幸好妻子吴氏悉心照顾，才帮他慢慢缓解了压力。

3年后的秋天，他第三次来到武昌参加乡试，再次失败。从此，李时珍对科举考试失去了兴趣，也是从这时候起，他暗下决心，不再参加乡试，跟随父亲学医。

（现快）



李时珍图